

建国后十七年党史概况

张 弓

(根据录音整理)

(一) 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再到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也只有半个世纪。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短暂的时刻，它还是一个新事物。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指出：“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社会主义尚处在实践探索阶段，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苏联斯大林的模式问题不少。我们自己的事情也不那么如意。社会主义各国都在自己的实践中探索道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总的说来，这个必然王国，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得很清楚。

我国的社会主义三十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成就。也遭到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误。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使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回顾党走过的这段历程，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

恩格斯讲：“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恩选集》第4卷458页）今天党的路线来之不易，是经历了两次大的折腾，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取得的。应该十分珍视这个付出了重大代价而取得的伟大成果。我们要系统地回顾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加深人们对今天党中央路线的认识，以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党的行动，步调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就是我们研究 and 学习社会主义三十年党史的目的和出发点。

建国后的三十年，大家都是过来人，各人都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现在大家都在思考问题。可以说目前是一个沉思阶段，反省、总结经验的阶段。各方面议论纷纷，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还有许多问题认识并不一致，这是好现象，它有利于互相切磋、启发、比较，探索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搞得比较好些，更好些。

研究党史根本的态度还是要实事求是。在如何看待我们党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态度是要防止的。一种是把党看成完美无缺的。过去我们在宣传上曾经强词夺理，夸大党的作用和成就，否认党的缺点和错误，这是形而上学，不符合实际的。现在又有另一种倾向，即抹煞党的成就，贬低党的作用，甚至把我们党说得一无是处，任意丑化党而不感到痛心，这也是错误的，不实事求是的。

三十年来我们这个党虽然犯过大的错误，但总的来说，还不失为光荣伟大的党。是经受了严峻考验，克服了困难，纠正了错误并且战胜了内外敌人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党。

首先，在我国建立和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消灭剥削和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制度虽然今天看来还不很完善，但历史已证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不仅能够战胜内外敌人的破坏和颠覆，而且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领导十亿人口取得了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仍然是三十年的基本实际。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根本转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变化。这一转变使百多年来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奴役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外力支配，并在世界上发挥重大积极作用的新中国。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进步力量。它顶住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社会进步的斗争。

其次，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落后的废墟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四化奠定了基础。就工业来说，现在我们已拥有五千亿元的固定资产和三千亿元的流动资金，比之建国时的128亿元增加了近四十倍。职工队伍近一亿人，比解放初增加五十倍；大专毕业生三百万，加上中专毕业生总共已有七、八百万。解放初中学以上知识分子总共才三百万。建立了许多新的科技部门和少数的尖端科学。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一九七九年每人平均收入201元，比解放初的76元增加近二倍（以不变价格计算）。

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人物向资本主义学习，提出了许多救国救民的主张，但都破产了。蒋介石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更将中国带进了死胡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将中国人民领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起点。在这一新的征途中，我们难免要有挫折和失败。正象民主革命28年中我们难免经受挫折和失败一样，当我们克服了错误，端正了路线，党就领导人民继续胜利前进了。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在我们面前困难还很大，问题堆积如山，但革命者最重要

的是要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能失去信心，并且敢于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人民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今后准备怎么办，使人民得到鼓舞，受到教益。从一九七八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不断地认真地研究了党在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水平和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已大大提高了，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成效显著，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人民对党的信任也日益增强了。

对于党犯的错误，要不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和步骤向党向人民讲清楚，特别是对老人家的错误可不可以讲？至今有人讳莫如深，顾虑重重，以为这样对党的威望会有好处，其实这正适得其反。马克思讲：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他主张无情地自我批判。他讲：“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转引自中央党校《理论动态》224期，第19页）列宁讲过，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正确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是一个郑重党的标志。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一些同志没有传达他在六一年六月的一次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以后说：“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们指出错误，是为了今后避免和减少错误，教育党教育人民，这完全是积极的。研究分析错误，重在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必须采取实事求是，严肃慎重的态度。对于毛主席的一生来说功大于过，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对于毛主席的功过要讲清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以功掩过，文过饰非，也不可因过而抹煞他的伟大功绩。现在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一方面是感激的心情，一方面又因为他晚年的过错而有埋怨情绪。这就要避免感情用事，要十分注意冷静的科学分析。否则就要犯错误，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国内国际、当今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

列宁讲过：“恩格斯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马克思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但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应当采取另一种态度，的确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否则你会犯一千次错误。”（《列宁全集》第35卷256页）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特别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和革命作风，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党的领导者、干部和党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民解放军战士、革命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由他的科学思想和革命作风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干部和党员，现在是今后仍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巨大功绩，就是不承认客观的历史，不承认革命的传统。这样的态度是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

（二）对建国后十七年党史的基本回顾

总的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是党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按照中国社会的特点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

创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征途中曲折前进的历史。十七年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折：一是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折；二是由过渡时期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折；三是党的工作重点由革命到建设的转折。前两个转折是转得好的，成功的，后一个转折发生了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扩大的错误。但总的看，十七年间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在1958年的下半年到1960年的下半年，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内党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和其它各项事业的损失。经过调整，国民经济才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因此，十七年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一个上升、下降、再上升的之字型的曲折发展历程。

十七年的历史，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1949年10月—1956年）；

第二段，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1957年—1966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代表帝、封、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全国大陆覆灭，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基本完结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开始了。列宁讲：“政权在那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标志”。因此，在消灭三大敌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即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观点和毛泽东同志革命转变论的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上正确地制定了适合我国社会历史情况的革命转变的战略和策略。其中要点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奠定社会主义的初步经济基础。

二、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作为党夺取政权后的中心任务。实行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建设事业，使党领导的各种运动，各项工作的进行，都围绕生产，促进生产。

三、对资产阶级实行区别对待。对资产阶级的主体——官僚资产阶级实行坚决消灭和镇压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民主爱国人士采取团结改造的政策，一律包下来，给他们选票和饭票，将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统一战线。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爱国人士过好“三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

四、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已经开始，而民主革命大量遗留任务急待完成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党一方面指明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全局而言，这一矛盾已成为决定历史方向，决定革命道路和制约其它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同时又顾及到建国初期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还在相当大的地区和部门中尖锐地存在的事实，采取了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先后缓急，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避免全国“一刀切”或“四面出击”的策略，这样，革命

的转变和主要矛盾的转化实际上经历了三年的历史过程。

建国头三年由于党实行了革命转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和异常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前，党在紧紧抓住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中心任务的同时，进行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等运动。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对资产阶级投机倒把，扰乱金融，施放五毒等不法行为也曾先后开展过激烈而又有节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在上述各种运动推动下，一九五二年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

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五三年党适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总结建国三年来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党考虑到：

一、经过三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农联盟已空前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已巩固地确立起来；在经济上、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确立了稳固的领导地位。

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较弱，在党的正确政策下，表示拥护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党在三年中通过稳定物价的斗争、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的斗争，已成功地摸索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改造的经验。

三、认识到搞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共存，同时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小农经济处于分化中也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

在上述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在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时，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丰富发展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明确地加进了“逐步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内容。

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对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引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明确地提出要改造小私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公有的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

三、七届二中全会以及建国初期，我们党曾设想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是很远的将来的事情，是要等到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再来进行，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明确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国即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就给建国前后，我们曾经叫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赋予了社会主义逐步改造和逐步过渡的新内容。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保护富农”等过时的观点和提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并举，而又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集中了很大的力量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用社会主义工业化吸引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保社会主

义制度在我国的胜利。

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党的政策大体是正确的。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再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经历了七年的时间，而我国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即有二十多年的互助合作的传统和工作基础。因此广大农民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比之苏联二十年代末期实行集体化的情况要顺利得多，而且避免了生产力的破坏和下降。问题是：从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了，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群众觉悟的程度，发生工作粗糙，要求过急，在一些地区违背自愿互利原则，侵犯中农利益等缺点错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和资产阶级建立了特式的阶级联盟，用和平赎买办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早已提出来而未能实现的设想。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历史使命。并逐步完成了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任务。这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新贡献。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共付出了三十亿元〔即从建国初期搞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四马分肥到公私合营后实行定息（五厘）的十七年总计〕。而且使我们利用资本家的企业，繁荣市场，为国家积累资金，增加了财富，壮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的缺点是：（一）在一九五五年冬的社会主义高潮兴起后，步子过急，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忽视了生产发展的实际要求，不适当当地实行相当大的“裁、并、改、合”，使许多原来小厂小手工业经营的花色品种多样的特点，被统一的、单调的产品代替了，原有原料产品供应渠道也割断了，商业网点大量减少。对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二）对原有企业的一些好的经营管理方法，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否定了。而又没有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创造出适合各种不同情况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三）在改造高潮时，有相当大的一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它劳动者也盲目地带入公私合营。这些本来可以保留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当时又把他们统称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也是不妥的。（四）未能适当保留部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和流通事业。

在一九五三年——五五年期间党内反对了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在全党为贯彻实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时刻，反对篡党野心家的斗争，算不上是一次路线斗争。因为高、饶他们并未提出什么与中央相对立的政治纲领。这一斗争是必要的，它对于巩固党的团结，抵制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保证全党团结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斗争所采取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主要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保护多数，团结教育，斗争有节，基本没有扩大化。

至于这一期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不适当的（中央已发76号文件予以平反）。当然对胡风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文艺理论观点是可以进行批评的。但采取全国政治运动当作所谓反革命集团打是“左”的扩大的错误。这违反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思想政治理论观点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办法去解决的原则。这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伤害。这是一个教训。它证明了，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政治观点、文艺观点必须采取双百方针，透彻说理明辨是非。用群众性政治运动压制的办法是错误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全党的努力，许多原定指标在一九五六年即提前完成了。四年中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一，手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百分之十四，农业总产值完成原计划百分之一百零一，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三十。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好的，五年计划做到四年完成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办的。据计委的同志讲，这是建国以来，迄今唯一按计划执行好的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计划，有的没有执行，有的根本没有具体计划，或只有一个初步大纲。

在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功绩是：（一）对“七大”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工作作了正确的总结，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二）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三）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执政党的地位，要求全党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等。“八大”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而且直到现在还有现实指导意义。

但是，“八大”是在一片胜利声中召开的，缺少反面的经验，事实证明光有成功经验是不够的。由于经验不足，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针，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对发展党和社会主义民主等的讨论和规定都不够充分，也未规定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实施办法和党纪国法作为保证。

当然这只能作历史经验而总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八大”不可能做出那样严格的规定。我们不应苛求于“八大”。因此我们认为“八大”是迄今社会主义三十一年来所有代表大会中最成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八大”通过的各项文献和重要发言，同毛泽东同志在“八大”前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代表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高峰。

总之，建国后的前七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顺利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面貌欣欣向荣，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经济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党的威望很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现。这在理论上和实

实践上初步回答了象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为什么能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在纷繁艰巨的任务下，特别是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党不但没有犯大的错误，而且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呢？单就党的领导经验来讲，提出以下几点，请大家研究。

一、建国初，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和“七大”以来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

二、保持了战争年代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

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肯于学习，勤奋工作。

四、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保持了党的先锋队的战斗性和组织纪律性。

第二段，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十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并为纠正正在探索道路中所犯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这个时期工作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特别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重错误。这个政治上的错误，在这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虽然还没有支配全局，但也没有得到认真的纠正，反而逐步发展和升级，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害，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经济建设中重工轻农，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不足的缺陷暴露得愈加明显了，加之波匈事件的教训，促使我们党考虑走自己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党中央经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吸取苏联的教训，由毛泽东同志加以集中整理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理论上、政策上作了新的探索，两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即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文章分析了新形势下国内矛盾的变化，论证了党在建设时期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方针政策。很可惜的是这种科学性的探索，并未始终一贯地坚持去。而在不久，连毛泽东同志本人也违背了这些理论和政策。

从革命到建设时期，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我们党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九五七年党提出整风，目的是为了贯彻“八大”精神和上述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以便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即发生了少数右派猖狂进攻的情况，在反右斗争中，我们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结果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五七年，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如有人攻击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公开提出要“轮流坐庄”，甚至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骂得一无是处。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对这种进攻，给予批判反击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如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等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是扩大化了，据最近对右派问题复查结果表明，全国共划右派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五十二人，绝大部分都改正了。这表明把一大批人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使许多同志和朋友长期受到了委屈和压制（也牵连到家属子女），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一错误也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受到了挫折。

为什么会造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一、我们党长期搞阶级斗争习惯了，这种工作方法尚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化，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对大量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尚不善于对待。面对那些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文化矛盾、思想矛盾、以至个人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缺少经验和新的处理办法，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和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党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重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为以后长时期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提供了“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

二、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国际反共逆流、反革命颠覆活动和修正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估量过分，对国内右派的进攻形势也估计过重过大，本来是“吹皱一池春水”的形势，误认为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情况。以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和朋友。

三、党在胜利面前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了，还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因而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影响极为浓厚，对党的影响也很大。加上我们党长期处在革命战争和剧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习惯。又因为接连不断的胜利，歌功颂德的话听得多了，因而对待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很尖锐刺耳，有的还不完全正确和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还有的是由于右派中知识分子居多，就不加分析地认为是知识分子带头反党。说他们尾巴翘得太高了，有意要敲打他们，甚至因为我们党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把一些专家学者的科学见解和建议，误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打击。

四、当时还不适当地支持党外个别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的建议，在全国发动所谓“四大”，以致造成到处紧张的动乱气氛。对此，又采取“一刀切”，在全国发动“反右”政治运动，结果有一般思想政治问题的人中，有不少被当作“右派”打了。

接着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之后，是批判反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五年农业改造高潮出现以来，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情绪。一九五七年十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矛头直指×××同志和××同志。说他们是“促退派”。原因是—一九五六年在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下有人头脑发热，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冒进，发生了基建投资过大，职工增加过多，农业贷款过多，

许多地区将原订十二年内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在三、五年内做完，结果，造成很大财政赤字和物资供应紧张的被动局面。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报告中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客观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勉强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名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社论提出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矛头是指着他的。并且硬说这是给群众泼冷水。因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九——十二月发表的《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中，就已经过分地估计生产发展的高速度，过分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政治”作用的因素，提出要“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虽然在毛泽东同志写的《序言》中也有“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这样的话，但老人家的本意是要批“右倾保守思想的”，所以当别的同志提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而且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应着重反急躁冒进倾向时，毛泽东同志就认为是曲解了他的原意。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其中提到了“跃进”的口号，毛主席对这篇文章非常赞赏，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极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问题，接着一月末的最高国务会议、二月的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月的成都会议、四月的汉口会议、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曾多次批判反冒进，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从“促退派”、“稳妥派”，到“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是“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由于反冒进右派才进攻”等。而且毛泽东同志个人专断地规定今后不准再反冒进。这种批判致使当时党内空气紧张，恐右病大大滋长，这恰恰给五八年的“大冒进”造成了浓厚的气氛。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体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贫穷落后的愿望。总路线的要点规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就主要方面，首先是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说，是“八大”一次会议正确路线的继续。在党的总路线鼓舞下，人民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在许多生产领域和科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局面。

但无可否认一九五八年所兴起的三年“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失败了。党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有关方面估计仅国民收入一项损失即达一千二百亿元，政治、思想、作风上的损害就更大了。

造成失误的原因，一般说我们没有独立搞大规模建设的经验，要付出一定的学费，这是必然的。但再进一步想一想，为什么建国初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复杂艰巨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犯大的错误，反而在建设有了一定经验时犯这样大的错误呢？特别是又为

什么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之后要犯这样大的错误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叶副主席在国庆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造成大跃进失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开始不谨慎了，这个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但还要加以具体说明。我考虑这种骄傲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的表现：

一、党的建设总路线的制定，是在反右派扩大化和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制定的。因此，制定总路线的指导思想上即缺乏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和措施是凭主观的愿望和一时的热情提出来的。名曰多快好省，实则只讲多快不讲好省，鼓足干劲又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背离，这样的指导思想必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二、胜利冲昏头脑，急于过渡，超越阶段，超越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进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理，搞“穷过渡”，“白拉平”。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党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次会议冒然地决定当年钢铁生产要比上一年翻一番，以此作为实现工业大跃进的“纲”，并且决定把刚成立不久的高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人民公社。错误地认为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可加快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北戴河决议公开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实践表明，这不是搞共产主义，实际是搞农民平均主义，它严重地剥夺农民的生活资料，大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列宁讲：“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否则共产主义是一钱不值的。”（《列宁全集》第29卷163页）

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空想。它的基本点可以归纳为：1.农业公社“一大二公”，农工商学兵一体化。2.实行“穷过渡”的绝对平均主义。3.吃大锅饭，搞供给制。4.组织军事化（“又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5.工农知识分子过同等生活水平，搞“白拉平”。6.保持小生产自给自足。这样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

三、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自以为是，片面理解自力更生，轻视当代科学技术，以为群众发动起来靠土办法即可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搞上去，甚至超过别人。轻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四、党内和国内生活不民主，采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办法推动建设，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它还助长了强迫命令、虚报浮夸等不正之风。

五、把经济建设工作混同于革命斗争的进程和战争的进程，企图用发动群众运动的办法，象组织战役和战斗那样，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强调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不立足于经济本身的客观可能及其发展规律。列宁曾经对当年苏联建设初期的类似错误提出批评。他讲：“革命所作的以及能够作成事业过去是、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依靠英勇精神而取得的。我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

里，因为情况改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在这里不能向后看，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任务了。”“这件工作要做好几十年，要花极大的气力。决不能用我们进行军事工作的速度和条件来进行这项工作。”（《列宁全集》第33卷146—147页）在这里“绝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要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列宁全集》第29卷385页）

陈云同志在党的三中全会上讲建设的速度问题时，他说，什么叫高速度，符合国民经济规律的“有计划按比例，就是高速度”。这是总结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之谈。

上述错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逐步有所觉察，陆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十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八届七中全会（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直至庐山会议的前期（七月），从理论上到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纠“左”的措施。这些会议反复强调：（1）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2）划清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3）反对“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4）要求重视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5）逐步地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而开始部分地对经济工作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有所扭转。

然而纠“左”有严重阻力，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在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借口下，拒绝改正错误，而且还攻击纠“左”是右倾保守主义。实际上许多部门和地区“左”的错误并未纠正。根本原因我认为：

（一）三面红旗是不可触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是指出它有缺点和错误谁就必然倒霉。因而人们的心理状况怕右不怕“左”的思想始终占了上风。这种情况不改变，纠“左”就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立竿见影。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之火以及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有它深刻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把火既已点燃了，就不易轻而熄灭。

在纠“左”过程中又发生了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同志以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因而纠“左”的进程被打断了。“左”的错误又占了上风，于是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党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但回潮了，而且比五八年的“左”倾发展的更为完备，从经济工作指导上的“左”的严重失误，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左”倾错误，因此它更带有全局性。庐山会议还开创了把党内斗争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党内斗争扩大的先例（过去讲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现在讲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并且提出了一个党内“民主派”的错误口号。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民主，打击了敢于实事求是地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在党的会议上向党反映情况和提出对工作的批评意见的同志，助长了个人专断。

庐山会议决定林彪代替彭德怀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从此，他开始在军内进行拉帮结伙，打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个人迷信的活动。

庐山会议后，完全错误地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使原来纠“左”的东西成了右倾受批判，“左”的错误恶性发展，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加上赫鲁晓夫撤

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使我国遭到严重的困难。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实践的惩罚，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倡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十一月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12条），这是纠正左倾错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上述方针和指示，并且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创议，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次会议是克服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一个转折点。

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解决，特别是解决了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高指标，高征购（60年以后），划小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一九六一年六月决定取消），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等，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此外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分别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等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套在当时条件下基本适合我国情况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及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省地县负责同志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给错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会议对贯彻八字方针问题，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要努力克服盲目性，认真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对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根源还缺乏必要的清算和深刻认识。不给彭德怀同志等平反，就说明了“左”的错误并未彻底纠正和认识，而党内“恐右病”也就解决不了。林彪在会上起了恶劣的作用，说什么造成困难的原因是没有“高举”、“紧跟”，是“受到干扰”等。

一九六二年二月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陈云同志作了题为《目前财政情况和应采取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五月，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两次会议对当时财经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提醒全党必须对困难形势有足够的认识。会议坚决贯彻八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和工业生产战线（实行关停并），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紧缩财政开支，加强财政金融统一管理，对某些商品采取高价政策，回笼货币等。两次会议对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起了有效的作用，到六年底经济形势就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形势稍有好转，就又要抓阶级斗争了。在严重困难情况下，农村曾发生了部分单干，包产到户（属于生产管理责任制），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等，封建迷信活动也多起来了。这些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我们执行“左”倾政策造成严重经济困难有关，而且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根本的办法是纠正我们工作中“左”倾错误的问题，但又

被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彭德怀同志由于对七千人会上指责他“里通外国”等有意见，给中央写了申诉书，又被说成是搞翻案活动。

六二年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接着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除了肯定经济形势的好转，要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外，毛泽东同志又把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他把社会主义一定阶段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夸大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而且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一九五七年以来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使党在长时期内陷于难以解脱的思想政治的混乱之中，这是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

十中全会，批单干风和翻案风（指彭的申诉书和小说《刘志丹》），康生诬陷习仲勋同志为高岗翻案，说这是利用小说反党。

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提出鉴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要把做好当前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这对于当时继续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没有受过多的干扰，起了好的作用。

十中全会以后，许多地方陆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对城乡基层组织中，在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帐目不清，财务不清，在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多吃多占，官僚主义，组织不纯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极少数带有阶级斗争成分），按照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把这些问题一概说成是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但是在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左”的口号影响下，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四年九月，先后在杭州和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有关农村社教的两个“十条”以及后来一九六五年二月制定的二十三条，对农村形势的分析都发生了“左”的错误。“二十三条”虽然做出了要保护干部的大多数，四清要落实在生产上等正确的规定，但这个文件又认为全国城乡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出“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说走资派从地方到中央层层都有，并且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说“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开展农村社教同时，在城市部分工厂和个别单位也开展了社教运动；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从错误地批判《刘志丹》小说开始扩及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美术各个部门的代表人物，说他们是服务于某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甚至说文化系统十五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教育部门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着。说农村生产队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的大部分领导权也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群众手里。认为统战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部，农村工作部是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三自一包”的，以致常常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总之，由于对国内党内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夸大了阶级敌人复辟的危险，当时搞的许多批判，也都是无限上纲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具体策划的对《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使这种政治陷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且直接成

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十中全会后的国内形势，虽然阶级斗争一步紧逼一步，但就全局来说，党的中心注意力还是搞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农业战线，对工厂企业实行大规模的关停并转，保证重点建设和重点工业企业，使工业基建的发展同农业的生产水平相适应，在工业部门内部整顿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做到综合平衡。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规格，使之成龙配套，当时的口号是“抓农业、轻工业，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

党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团结一致，纪律严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证明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和人民的团结是巩固的，党是对人民负责的和值得人民信赖的。这一段历史有力地证明，我们党不愧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一九六三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一九六四年底，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提出，大大地鼓舞了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到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已达到和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一九六三—六五年我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七点九，其中轻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二，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九。农业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一，达到了很高的速度。当然这些都带有恢复国民经济的性质。

总之，十七年来我们党走过曲折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只有经过错误和挫折，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列宁全集》第28卷54页）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正在实践发展中的新事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不可能不犯错误，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建设的道路也不会是笔直的。恩格斯讲：“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差不多还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错误的前代要多的多。”（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全集第3卷125页）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要有相当的过程，我们只能从总结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使我们日益变得聪明起来，也就是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客观的实际，把我们的事业办得更好些。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恩全集》第4卷285页）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在总结三十多年的实践和认识，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今天的情况我觉得犹如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期，那时全党对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飞跃。整风的胜利，使全党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历史性胜利。今天我们全党又正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通过这一总结，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将有一个大的飞跃，这是一次党的伟大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相信经过这次的总结和整顿，全党将团结在中央的正确路线下，夺取四个现代化的胜利，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将步入兴旺、发达、文明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以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子孙。